

美好人生何處尋？

李智達

世界偉大的宗教思想都會探討何為美好社會和人生的議題，儘管對人性的定義各有不同。本文試從基督教、佛教、盧梭與亞當史密斯的思想分析這個問題。

為何選擇這四種思想？

這四個思想表現了不同的思想模式——宗教集中在個人的道德信仰；盧梭與亞當史密斯論市場和共和體，則是由社會和群體出發。宗教著重信念和心性形而上的培育，盧梭與亞當史密斯則是理性現世的，著重的是當前政治和生產的運作方式。現在就去看看達到美好人生和社會的不同方法，並剖析哪一種最有價值。

四種思想如何達到美好人生和社會

一、基督教——由信心帶領我們

在《約伯記》中，上帝問約伯：「我創造世界時你在哪裏？」¹人對於神而言十分渺小，怎能了解上帝的計劃？所以，人與神的關係應該建構在「信任」之上，相信「神愛世人」。既然神對一切自有安

1 馮象譯：《智慧書》（香港：牛津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648。

排，所以我們即使如約伯般面對逆境，都不應抱怨，而應把自己交託給神——這是一種「信心」的表現。而我們不做令神不悅之事，不犯罪，不欺騙，愛人如己，導人向善，這樣的話，宗教的力量就會帶領我們達到美好人生和社會。

二、佛教《心經》——以般若了解世界

人對於生死、禍劫、流變，往往感到恐懼和無助。在佛家的角度，這是源於「我執」和不了解「無常」的結果。在佛家的角度，我們要了解「互即互入」(inter-being)的含義：事物不可能孤立存在，一切事物皆是與其他事物互即互入、相對的存在。人有成功，就有失敗；人看見善良，罪惡就存在；人一想到生存，死亡就存在。所以佛家教我們面對生死、禍劫、流變時，不必過於執著，因為死亡帶來生機，無常帶來機會。一行禪師說：「無常萬歲！」²空掉一個孤立的自我，就是這個意思。世間的混亂是源於無窮的物慾和執著，一旦去除我執，人的苦惱就能消解，社會會更和諧。

三、盧梭——政治共和體

盧梭大力反對以強力維繫的政權，認為強力並不能使政權合法，不能達到政治共和體。理想的社會是「每個人也是毫不保留的奉獻自己³……義務和利害關係就迫使締約雙方同樣地要彼此互助」⁴，結合大家的力量，共同合作，沒有獨裁君主和奴隸制度，人由享有「天然的自由」變成享有「公民的自由」，達致更文明美好的社會。

2 一行禪師著，明潔、明堯譯，《與生命相約》(台北：橡樹林文化，2002年)，頁161。

3 盧梭著，何兆武譯，《社會契約論》(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02年)，頁20。

4 盧梭著，何兆武譯，《社會契約論》(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02年)，頁23。

四、亞當史密斯——專門化和市場

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在《原富論》中提到專門化：製針工人由一日生產十數根別針到一日生產數千根別針，當中的秘訣就是利用專門化大大提高生產力。人要專門化，就要脫離古代自給自足(自己打魚、種米、種菜)的生產方法，專門生產某一種產品；賣出貨物得到收入後，再跟別人買其他產品，市場就出現了。市場出現後，人做什麼工作？資源怎麼使用？這些都由市場決定。加上私有產權制，產量得以大大提升。更高的產量在某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生活質素，所謂「衣食足，然後知榮辱」，這正是建立美好人生和社會的基礎。

百家爭鳴

——哪一種思想對我們思考美好人生和社會最有用？

比較這四種思想，宗教與社會科學是一大對比：前者傾向形而上(心性)，後者傾向實用(理性)；再細緻分辨，佛教和基督教這兩個宗教則是自我智慧與信仰宗教的對比；盧梭和亞當史密斯代表的兩種社會科學則是政府與市場的對比(由共同體維持公義對比用鈔票投票)。既然以上四種思想都對如何達至美好人生和社會有所看法，那麼誰是最有啟發性，最有用呢的？

先比較佛教和基督教，兩者背後的理念大相逕庭。《心經》叫我們了解「互即互入」的無我，教我們破除名相，看化世情，獲得「般若」(即無上智慧)而涅槃，這是一種「般若」的表現。基督教則叫我們不要猜測或抱怨造物主，因為人是卑微的，無法了解神的智慧；所以我們無論面對任何逆境，都不應抱怨，應該把自己交託給神，讓神安排，這是一種「信心」的表現，與《心經》的「般若」全然不

同。我認為，人真心明白佛家的智慧，看化世情，坦然面對逆境，比依靠看不見的神來得踏實，而《心經》叫我們了解「互即互入」的無我是較實在的思想治療。

比較盧梭和亞當史密斯，前者主張由共同體維持公義，後者主張用鈔票投票。共同體的民主政制有其優點，例如較著重民意，避免「絕對的權力引致絕對的腐化」；價格競爭亦有其優點，如我要買某價值的產品，我必須生產某價值的產品去付款，沒有其他非價格競爭(如排隊、打架)引致的經濟損失，而價格亦是指導資源分配的工具。另一方面，共同體投票雖產生了民主政府，卻因選舉花費很大，不可能事事投票，始終也要政府有形之手直接管轄(command economy)。由政府指導資源分配，收集市場資料的成本很高，資源分配錯誤會引致很大的經濟損失，香港政府已有不少政策如此；全由市場指導，資源分配雖符合經濟效益，但看看大陸在經濟改革開放的同時，道德民智追不上，官商勾結及貧富懸殊令人擔憂。

正是如此，這更加顯得形而上、心性的培育重要，市場和政府這些制度只是工具而已，回顧中國歷史，唐太宗的三省制十分成功，達至貞觀之治，玄宗延續盛世後卻將之一手破壞，朝政日壞，全在使用者一念之差。當然，從效率角度而言，利用法律、迷信、政府有形之手去約束人民或能得到「速效」，但長遠而言則未必達至穩定，因人民只是被逼服從。

總括而言，經濟學建立了美好人生和社會的基礎，共和體輔助社會運行，宗教成為人民的心靈依靠，但最需要根治的還是人心，去除物慾和階級主義，明白互即互入的空，學會慈悲，可望真正達到美好人生和社會。

參考書目

一行禪師著，明潔、明堯譯，〈般若之心〉，收入一行禪師，《與生命相約》，台北：橡樹林文化，2002年，頁150–92。

馮象譯，《智慧書》，香港：牛津出版社，2008年。

馮象譯，《摩西五經》，香港：牛津出版社，2006年。

盧梭著，何兆武譯，《社會契約論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02年。

Adam Smith. *The Wealth of Nations*. Ed. Edwin Cannan. New York: Bantam, 2003.

